

資料卡片

(第四集)

(七三一九六期)

新華社內蒙古分社

《资料卡片》编辑十原则

〔编者按：本刊曾订编辑十原则，现予重新发表，以昭告广大同仁，并求读者批评、监督。〕

为了将《资料卡片》办成国内颖异不群、锐意拓展、各界钟爱的专刊，特制订此编辑十原则，作为编刊严格恪守之准绳，读者督检的依据。我们本着“广泛采录，精心编选”的一贯宗旨，发扬经济上毫厘不爽、内容上字句不苟的传统，匠心经营，俾得上述原则日臻完善，得以实施，使刊物乘着光明中国狂飙突起般的改革雄风，向着新世界的宏丽长空奋飞。

一、重质择优原则 质量，永远是刊物生命和希望之所在，编者不可草草。本着重资料宝贵和旨趣雅势之原则，须从涛浪滔滔的稿件中严辨优劣，刻意精求，务取上品。力避搪塞和选稿的随意性。

二、综合积累原则 将散见于书林报海中的文章资料，分类以从，巧为综合梳理，形成阵势。有些须长期积累，发于一端。克服支离零碎诸弊。

三、简约凝炼原则 力求精而不泛，为读者奉献言约意丰的“干货”，好文之较长者亦须删枝蔓，割弃冗赘，不可拿来就用，少选大论长篇，多择精萃篇什。

四、搜奇觅珍原则 以奇为宝，出奇制胜，耐奇而不失其真，赏华而不坠其实。苛求篇篇良玉，

字字珠玑，实不可能；但须探幽访胜，勤于搜索绝然异样之奇珍，以饕读者。

五、改错刊误原则 要尽最大可能校正原文之谬误（包括义、文、句、字、标点），对不易辨别、似是而非之处，须钩稽考据，尽量防止以讹传讹。刊出后倘有墨误，随时更正。

六、加注注释原则 对古奥晦涩、含混抵牾的文字核实作注。资料虽好而立论偏颇，或主旨不明，或须加意褒贬者，则加编者按语。

七、索引照应原则 在必要处作书目、文章、人名之类的索引，后面发文与前面关联的（补充、反接、呼应、发展），须加说明，以便查检。

八、避免重复原则 资料发表日多，重复殊难全免。特设专人查重，非重不可的文字从简，并加说明。

九、分类得当原则 分类是相当复杂的学问，难以尽善。栏目不可不分，亦不可分得琐细，每每只能择其大者而从之，取其一点不计其余。但亦须大体得当，谨防杂乱和过分交叉，使栏目内涵相对稳定，形成若干保留栏目，在相对稳定基础上求栏目的更新。

十、系统成套原则 刊物内容品类繁多，不可能、也不必每栏都成系统。但出之既久，会渐成体系。这就须有长远眼光，及早依类掇拾，使之有所统属，积以时日，或将已发稿整理成套，或立题征稿补充，以备将来编成各类《资料卡片》丛书予以出版。

顾 问	于光远	于北辰	于浩成	公 刘	王 蒙	包遵信
	刘云山	刘再复	白朝蓉	许承琦	江一真	李泽厚
	李洪林	阮 波	严家其	邢贲思	宦 乡	吴大琨
	沈昌文	胡昭衡	高 放	费孝通	张 炯	童大林
	耿 峰	温小钰	楚 庄	蒋子龙	蔡尚思	薛德震
编 委	张选国	何东君	张瑞生	黄 彦	郝耀华	吴彤申
社 长	张瑞生					
主 编	黄 彦					

摆脱历史情性之路

在改革的实践中,思想观念、心理深层结构的变革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否重视思想观念和心理深层的变革在全面改革中的先导作用,是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和改革的彻底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思想观念和心理深层的彻底变革,仍有待于体制的改革,只有新体制的建立才能为新观念的确立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

从戊戌变法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先改造国民性(属于社会心理范畴),开民智,新民德,然后进行政治变革;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进行政治变革,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务之急乃是政治变革。

中国社会的改革无论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方面,还是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都受到社会心理中沉积的旧的传统观念和愚昧、盲从、迷信、保守的国民劣根性的巨大阻碍。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可是,小生产思想在我国城乡还有相当大的覆盖面,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1)

官吏担任名誉职务;④各种生活、政治待遇皆以官职大小分等级享受;⑤由此产生权力拜物教,追求行政级别的晋升成为社会成员、组织和企业的主要目标。

6. 依附于官场的知识界,

①读书为做官;②知识分子虽有忧患意识,但无独立政治意识;③理论往往落后于实际,成为政策的注脚。

7. 清官主义的改革观。

①认为社会弊病不是源于制度本身,而是奸臣蔽主,改革就是反贪官;②反贪官要靠好皇帝和清官,产生偶像崇拜;③人才要靠伯乐发现。

三、强调共性压抑个性的伦理道德观,压抑了人的活动能力和创造性,使生产、科学、艺术萎缩,人的性格畸形发展。

1. 强求一律的事事观,

①思想上不许独立思考,学术上不许百家争鸣,对不同观点缺乏宽容精神;②各种选举与表决追求形式上的一致通过,生活习俗要求统一;③视绝对统一为正常,视多样化异常。

2. 中庸之道的美德观,

①判断是非应“折两端而采其中”,不偏不倚;②选拔官吏要求“温良恭俭让”;③思想上的“稳态症”,一切以“稳”为核心,人才应“稳重”,形势要“稳定”。

(5)

民族心理深层结构。

当今中国社会需要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须进行观念变革,并由此深入到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的变革,使我们民族真正摆脱历史情性。

(冯文杰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青年报》)

在现代化建设中 有哪些旧传统观念需要破除

中国旧传统文化,就其性质和体系讲,是封建的专制政治关系,宗法的血缘家族关系、小农的自然经济关系和封闭的对外交往关系的产物,至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扎根于人们的潜意识中。

一、在哲学历史上,主张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消极适应,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进行。

1.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用自然规律论证封建秩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2. 循环封闭的时空观,认为历史只按一定“轨道”循环,在封闭的地域中以老大自居。3. 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美化前朝圣世,遵循祖宗家法。改革家只能从先圣贤处寻找思想武器。4、

(3)

标准代替业务标准,以政治道德、家庭道德代替职业道德,以旧道德标准取人;③以关心他人名为,对个人的权利,尊严以至私生活横加干涉。

8. 畸形发展的两重性格,长期封建统治对人的压抑,使人的性格内向化、虚伪化、僵化,人际关系复杂化,变公开竞争为暗中排挤,变公开批评为暗地诽谤。

总之,中国旧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标准是与现代化相违背的,再加上近几十年的铁饭碗观念,严重束缚改革的开放的进行,因此,我们需要一次社会性的观念革新。

(四川郫县天街摘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理论信息报》)

开放搞活和观念改革讨论会观点综述

前不久,在上海市宣传部社联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当前条件下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围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观念改革”专题展开了讨论。与会者比较集中地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

在当前改革、开放条件下,政治思想工作应当立足何处?一些同志指出,某些似是而非的传统观念正在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渠道向人们进行灌输,对动员人民投入改革事

(7)

浑世主义的来世观，对未来无科学预测与危机感，盲目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5、妄自尊大的传统观，自以为是世界一切文明的正统发源地，外国的东西是异端的派生物，只能融于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6、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轻视理性和科学经验，一切以直接经验为准。

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社会观，扼杀了商品经济观念和民主政治观念，使社会停滞不前。

1、专制主义的政治观：君权至上，等级森严，以君主好恶为是非，视民主观念为异端。

2、义务本位的法律观：权大于法，当权者拥有一切权利，而百姓只能尽义务。

3、国家垄断的经济观，一切经济活动均应由国家垄断，推崇官商思想，重农抑商，重义轻利。

4、维护特权，反对竞争的小农平均主义：

①权力平均：上级将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使下级职责不清，互相牵制；②责任平均：有责任互相推诿，无人承担；③利益平均：在默许等级特权与官僚系统腐化贪污的同时，反对少数人靠竞争先富；④风险平均：自己不承担风险，也不让别人冒险；⑤事业平均：自己不想干或干不了，也不让别人干。

5、官本位，以官职作为社会中一般等价物：

①有钱不投资，而去买地、捐员外；②各种其它职称、头衔皆要折为官衔；③各种社会团体皆要（4）

业起着消极作用。例如，在有关“两个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中，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搬出了“中国物质文明低，精神文明高，西方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低”的老调，实际上否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了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夸大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从而把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显然，这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其立足点是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上，这些同志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与改革、开放成为两张皮，甚至成为冰和炭。思想政治工作要在鼓励人们投身改革、更新不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中起积极的作用，因而它自身首先应当坚决抛弃那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在谈到政治思想工作中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先进人物时，有的同志指出，先进人物应当有时代精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进人物，延安时代有张思德，解放战争年代有董存瑞，六十年代有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的不少精神今天还可以提倡和发扬，但同时应看到他们身上的时代局限性。今天我们应当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树立具有今天的时代精神的先进人物。

与会者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许多经济行为无疑会同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如何使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统一起来，今天应当有新的知识。（8）

自然经济的狭隘眼界限制着商品经济的规模和速度。

我们要改革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责权利结合，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然而，不少地方和部门舍不得放权，一些企业的领导人也不习惯有自主权；在许多企业和部门，奖金变成了平均主义的附加工资；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后，平均主义、害怕冒尖的思想仍然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甚至还面临着把家庭承包责任制纳入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自然经济的旧轨道的危险。

我们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可是，广大群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把希望寄托在出现“清官”上，把民主理解为“为民作主”，甚至知识分子中还有许多人把民主等同于封建时代的“民本主义”。

我们要实行文化体制改革，造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发展的环境。可是，广大群众却习惯于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不习惯在百家学说中抉择取舍；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还缺乏与政治家平等对话的独立人格，习惯于以权威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社会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上述社会心理表现出来阻碍改革的传统观念，可以溯源于“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途径所造成的（2）

3、重内轻外的修养观：重视“个人修养”，“慎独”，而轻视改造社会。

4、“节孝”为本的家族观：

①“修齐治平”理想，以孝为本，以“贞节”为名压迫妇女，维护父权、夫权；②将封建家长制原则扩大到政治社会领域，形成关系网，论资排辈和人身依附关系。

5、庸人主义的存在观：

①认为个人作为主体存在毫无价值，只能顺应社会、适应环境；②认为个人的一切欲望和发展自己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要为了道德准则而牺牲自己；③个人的活动只能是被动的、由别人安排好的，依附于别人的，不能主动有所好恶和选择；④无“高贵血统”者只能是天生的“草民”，只能终生作小角色、单一角色，不能幻想作大角色，多样化角色；⑤个人对家族亲友以外的人不负有义务和责任，从内心深处丧失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及社会责任感。

6、自我麻木的精神胜利法：

①宣扬相对主义的“吃亏是福”，讲究超脱，不计利害，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②主张“无为”，消极遁世，麻木不仁。

7、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体系：

①以传统道德为一切思想观念的核心，统率一切政治、法律、科学、教育、艺术观点；②以道德（6）

例如，义和利的统一。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历来宣扬“重义轻利”，它表现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们轻买卖、贬商贾，社会各阶层中，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等。在今天，应当冲破重义轻利的旧框框，毫不讳言发展商品经济，就是要重利、取利、追求利，而“义”的标准，应以法律为准绳，合法取利就是义，非法取利，就是不义，其利为不义之财。这应当是今天的义利统一观。

又如，效益和公平的统一。商品经济追求经济效益，鼓励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允许贫富差距的拉开，这就和传统的公平观相左。传统的公平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它要求的是结果的均等，于是就有“均贫富”的要求，就有“大锅饭”和“捆在一起受穷”的局面。但商品经济有自己的公平观，它强调的是机会均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无疑应当以这样的公平观来取代传统的公平观，从而达到效益和公平的统一。

一些同志指出，道德有继承性，但道德更有时代性，离开了一定时代的经济文化条件，来抽象地谈道德行为，谈善与恶，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出现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冲突，重要的是更新道德观念，使道德行为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一致起来，使对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和法制约束一致起来。

(上海徐亚玲摘自《文汇报》)

(9)

企业家论

对中国企业家成长机制的思考

企业家是商品经济的社会英雄，是企业行为的编者和灵魂。我国要尽快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不能没有千千万万个驰骋于国际市场的中国式优秀企业家。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就不会有我国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就不会有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显然，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现状惹人思考

中国没有“企业”，中国也缺乏甚至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一时间成为海外不少人士的话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论断呢？目前我国企业厂长经理的素质、水平、能力确实不高，能适应和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为数不多，尤其是能够在世界大商品经济中与国外一流水平的企业家相抗衡的优秀厂长更为稀少。这当然难以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一些大胆改革、勇于开拓、对国家人民卓有贡献的厂长经理，又纷纷中箭落马。厂长的构成水平也不高。在现任厂长中，主要由四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来较长时间担任副厂长、厂长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思想较守旧，不能吸收新东西、适应现代管理，工作处于应付之中；二是近几年在科技人员中提拔的一大批人，他们有较高

(13)

识型官僚代替工农型官僚。

刘再复说，现代意识是要把人当作“真的人”、“活的人”。任何人都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不仅要尊重有缺陷的人，而且要尊重人的缺陷，不应随意去干预他人的个性，应当尊重他们在社会舞台上自己所选择的角色，只要他这种缺陷不危及他人生存的权利。这是人道主义的深化。他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讲“人”，但往往把人变成封建宗法网络结构中的一个固定点，变成一种固定的存在，依附的存在。因此，个性总是要被消融在共性之中，主体一旦离开自己被规定的位置就要被视为异端邪说。这样，人要保持自己和社会的和谐，就要通过对个性和创造性的自我扑灭。这种文化观念传递到“文革”，就是“斗私批修”，到了“一闪念”也要扑灭的程度。

刘再复还说，我们有一大批中青年担任了领导职务，需要他们有知识、组织能力等各种准备，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现代文化观念的准备。只有现代文化观念上的政治结构才是现代化的政治机构。我们要树立以公民的资格、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与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以“为民作主”的观念去参与政治。

(周伟摘自《羊城晚报》)

(11)

因素还不起决定性作用，其关键在于一系列客观条件。

第一、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首先是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即事实上的小农经济，这就是中国企业厂长经理们植根的社会经济土壤。他们不可能摆脱自私、狭隘、保守、封闭、落后、愚昧的束缚。其次是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不仅未能彻底消除旧社会的许多弊端，相反出现了不少逆反现象，使优秀厂长经理的诞生成长失去了社会保障：一是集体领导出现的反差，缺乏协作精神的集体领导只能是一些人以集体领导为名，互相钳制，导致内耗过大从而压制厂长能力的充分发挥；二是强调“政治思想觉悟第一”产生的反差，以红代专，抛弃了不少优秀人才；三是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导致的反差，许多杰出的人才就此被打入另册。四是过分强调“服从需要”带来的反差，使许多优秀分子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行政命令的人才分布，浪费了不少人才，同时也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

第二、社会体制方面的弊病压抑了优秀企业家的成长，拔尖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首先是几十年来企业一直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品，行政部门包揽一切，企业的一些关键性权力并未得到。厂长任人摆

(15)

社会改革与观念改革

胡平在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撰文说，张贤亮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前提是观念的改革”批评看来是正确的，其实却是出于误解并包含着某种混乱。

所谓“中国社会改革的前提是观念的改革”一说，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都获得了新的观念之后使改革能够进行，而是指具有某种观念的少数个人，能不能在其它多数人仍保有旧观念的情况下便径直进行自己的改革事业了呢？假定前者拥有全权而后者又唯上是从的话，这大体上是可能的。但这种改革无助于促进自由民主的意识。至于张贤亮谈到美国人的习惯“先干起来再说”，那自然是很好的，可惜它基本上只有在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才办得到。具有某种新观念的个人，除非他能设法说服别人，尤其是说服有关的领导者，使对他的新观念采取赞同，否则他根本就寸步难行。

胡文说，随着现实的变化，残存在一些人头脑中的错误观念自然会逐步削弱，用不着我们一个劲地批判，那反而会扩大某种不必要的隔阂甚至对立。但另外一些观念的变革却是不可松懈、不可暂缓，而是必须当作首要任务抓紧进行的，那就是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观念、关于权力的划分与制约的观念。

(李文胡摘自《文艺报》)

(12)

企业家论

布，棱角被磨平了，敏捷的思维钝化了，创造性的潜力和意志退化了。其次，干部的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和近亲繁殖，再加之有关部门在考察干部时过分强调政治标准，喜欢“温顺的”，“听话的”，由此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恶果：能人上不去，庸人弄权术。再次是人才的单位部门所有制，浪费和埋没了不少优秀人才。

第三，我国还缺乏优秀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气氛。现今中国的社会风气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的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由于一方面有旧习惯的遗传，另一方面又有文化的继承性与返祖现象，使人们的价值观至今还蒙上不少宗法、儒学、小农经济思想的面纱，加之各种因素相互掺和，形成了许多一下难以解开的“死结”。其首要之点就是往往表现在以温顺、听话、服从、“点头哈腰”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和修养的主要标准，把一个人的独到见解、自信心和较强的能力，一概称之为骄傲自满、目无组织和领导、目无尊长。而那些本领低微，工作平平庸庸，只要善于“吹拉弹唱”，亦可平步青云，这样的人当然难以“拔”为优秀企业家。其次是群众不能高于领导，下级不能强过上级，年小不能胜于年长。其三是文人相轻，相互倾轧、相互诋毁、相互干扰、相互拆台、相互封锁。

(16)

政治改革起点应是观念变革

对于希望进行政治改革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最困难的不是建立一整套现代政治制度，而是改造传统的政治文化，使之与现代政治制度相适应。二战以后，不发达国家引进英美政治制度失败的经验，已充分证明此点。

我国现阶段政治改革应从观念变革起步，最重要的理由有两点：

我国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基本上勾画出了较好的政治制度，现实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弊病如过分集权、公民政治参与程度较低、民主权利未得充分保障、党政不分，大多数是来自一些非制度化因素，是因为政治观念的落后。有分寸有节奏的观念变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小，但产生的力量较大，一旦新的观念为群众接受，政治改革将会成为亿万群众而不仅是领导者和政治学家的愿望。

(郑世宽摘自《理论信息报》)

防止知识型官僚代替工农型官僚 须有现代文化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最近在—次报告中提出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加强人的现代文化意识。倘若没有现代文化观念，就有可能以知

(10)

的文化程度和技术专长，但是缺少管理的经验、知识和能力；三是过去和近几年从企业的劳模中提拔的一些人，他们工作勤恳踏实，能言传身教，但不懂现代管理，缺乏组织领导和决断指挥能力；四是还有少数人是从行政，甚至是从搞农业的干部中抽调来的，对搞企业一窍不通。从总体上讲，由于偏重“技术型”，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习惯，实际管理水平提高不显著，故更难谈得上创造性的工作和管理。其次，现在厂长经理们亦有自己的不少苦衷：一是在现存的体制面前无能为力；二是难以冲破复杂的关系网；三是缺少采取种种方式理解和支持他们的举动；四是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象核辐射一样，令你防不胜防；五是不正之风的干扰和影响。

思考中的反思

那末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我国厂长经理诞生和成长的主客观条件，或他们所活动的舞台环境。就主观条件而言，首先是正常的体魄和智力；其次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再次是勇于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其四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一般来说，这是人才成长的决定性因素。但作为一个优秀的配称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上述主观

(14)

其四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个人一旦做出贡献，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往往得到的不是鼓励、尊敬，而是白眼、冷遇，似乎谁能干谁就要倒霉。其五是至今不少人对知识分子还有偏见，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就要翘尾巴，甚至有的对知识分子就是不放心。

反思后的再思考

中国的厂长经理们应该从新的价值观，勇敢地面对当今社会现实，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学习“游泳”术，去拼搏，去与当今世界经济强人争高下。第二点给人的启示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全体人民应该共同努力，真正以开拓、改革的精神，去变革不利于我国前进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方面的弊端，以及旧的价值观念、旧的习惯和势力，为中国优秀企业家的诞生成长创造一切客观条件。

实质上，这里讲的主客观条件的具备，统一于一个更深刻更现实的东西，用商品经济的行话来说，就是竞争，即要有优秀企业家诞生成长的竞争机制。为此，有几点需要再思考：

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竞争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机制，同样它也是人才成长即我们这里讲的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机制。

(17)

代表国家利益，制定法律、规定；企业家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所以企业领导的产生和任免也不应受到行政干预。应该创造一个企业从企业利益出发，对企业领导进行选择 and 运用这样一个条件。

二、要允许企业家代表企业的利益，而不是代表行政利益。因为企业家是企业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承认不承认他代表企业利益，就等于承认不承认他是商品生产者。企业家接受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党的机关对企业的具体领导，基层党组织不应对企业作直接的经营指挥上的干预，而应该做好本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企业职工有高度主人翁精神，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态度去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

三、各级党政机关、政府要注意保护企业家。企业家处在国家、企业、职工、社会利益的矛盾焦点上，他们承担的压力、风险最大，他们的工作也最具体，而且每个决策又都是非常明确的决策。因此，也最有可能犯错误。如果不注意保护这些企业家，帮助他们承担责任，他们就可能被政治风浪吞噬掉。

四、要关心企业家的个人利益和疾苦。企业的

(21)

工程所的青年研究人员黄江南提出：“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把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作为目标。由此来考虑需要创造什么条件？采取什么政策。尔后去安排我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措施……”。对下一步如何推进改革，他着重谈了三点：

黄江南说，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把过去的产品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对于这样一场变革，自然会有各阶层的人参加。在整个社会的主动精神中，代表这种变革的骨干力量和骨干阶层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年，农村改革之所以进展得快，能取得较大的成果，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在农村改革中已形成了一个骨干阶层，这个阶层就是包干到户的农民。因为包产到户使农民都成了商品生产者，他们开始由单纯劳动力的农民转变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这些人有他们的意志、利益，也就有发展商品的冲动，对于束缚自身利益的条条框框就敢于冲破。由于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这个阶层范围广，改革和他们又都有着直接的利益。因此农民都在努力奋斗，改革也就容易推开，而且势头很大。

既然只有代表改革利益的人，才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力军。那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谁是这一利益的代表者，谁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呢？

(19)

要素，使它发挥高效率的作用。这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能力。”（〔日〕池本正纯《企业家的秘密》）这就告诉我们，企业家在市场正常的情况下固然可以发挥作用，在市场不正常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发挥作用。企业的兴旺发达要靠企业家，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要靠企业家。

为什么在强调企业应该成为真正的企业后，还要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企业由名不符实变成名副其实，是离不开企业家的作用的。第二，说企业应该是真正的企业，这主要说的是体制问题，而任何体制都不是万能的，真正的企业发挥作用也有待企业家的努力。第三，企业活力的增强当然需要全体职工努力，但企业家起着带头作用，组织作用，骨干作用。

（黄薇摘自《世界经济导报》）

改革呼唤企业家

当前改革的逻辑结果，必定会出现一个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一大批半行政性的官员厂长、经理将“脱胎换骨”，转变成为企业家。目前，造就企业家的宏观环境正在形成，厂长负责制已经实施，企

(23)

黄江南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一样,需要造就一批工商和服务行业的商品生产者。这样才能象农村那样形成改革的冲动。这一批人不是在行政官员队伍里,也不是改革的理论家或对策研究人员,更不是工人,而是企业里的厂长、经理,他们才是城市真正的商品生产的代表。所以,在城市要推进改革,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将厂长经理变成企业家和经营者,而不是单纯的生产管理者和管家。如没有这样一个阶层出现,就无从实现商品生产,不能设想存在一个没有商品生产者的商品经济。正是由于目前许多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厂长、经理还没有成为经营商品经济的企业家,城市改革的势头和推动力才不够大。

企业家的形成绝不仅仅是有一个经济环境即可,也包括了政治环境,任何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影响,所以得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来保证。

一、要打破企业行政化的格局。过去,由于一切都呈现行政化,从中央到班组形成连续的成套的行政化体制,企业不过是这一阶梯中的一级格子。企业家不是官员,也不应该是行政化的一个台阶,而是一个经济实体的代表。企业和上级管理部门的关系也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政府的干部(20)

业破产已有先例,租赁制、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已在一些企业试点。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切强烈地冲击着现任企业领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人们翘首等待着中国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集团的生成。

中国的厂长、经理不应该再是一种官衔。他们将以经营企业发展企业为职业。他们应避开拥挤的“官道”,组成对社会利益制衡的企业家集团,从而保证、维护、承受、推动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人民焦急地盼望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急切地期待一个脱离了政治兴趣、当官意识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的生成,将为中国众多杰出人才提供广阔的活动舞台。一切有为的厂长、经理们,你们具有潜在的企业家素质。你们要增强意识、冲破阻力、创造条件,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中国企业家。

(宋建明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世界经济导报》)

改革需要企业家

在武汉《企业家月刊》最近召开的一次讨论会(24)

没有竞争,就不会产生一流水平的企业家。其次是企业究竟由谁“领街”管理。既然要推行厂长经理目标责任制,又不对厂长委以人事、劳动等关键全权,厂长怎么负责?既然企业是一个法人,厂长是法人的代表,政府各层次又想千方百计地控制和截留企业的权力,这能叫厂长负什么和多大责任?实行厂长负责制本应责任、风险和权力对等下放,再次是我们的厂长经理能不能象农村专业户、城镇个体户一样成为“万元户”,为全民的致富起先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思考、反思、再思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大致的基本的结论:在中国现任厂长经理中,以及广阔的社会各领域里,有相当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的能人,问题在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限制了其才华的充分施展。一切有志于成为优秀企业家的人,应该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要光在那里抱怨、观望、等待,而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改变现实、创造现实,去跻身于世界经济强人之列!

(冯飞凤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工人日报》)

造就一个企业家阶层

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原社科院(18)

盈亏责任都压在企业家身上,他们责任最大,工作最辛苦,而目前企业家的收入并不高。社会和政府应该多关心他们,对他们的收入应作制度化的规定。要造就企业家阶层,就得给企业家一定的权力,对他们所应有的权力应该作出明确的规定。

(冯琪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国青年报》)

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体

社会主义企业家问题是这几年才开始重视的,确切地说是才开始提出的。过去,企业家往往被一些人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

现在看来,企业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必须存在的。搞活社会主义企业,搞活社会主义经济,都有赖于一批企业家,有赖于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人把市场机制理解为市场自动地发挥作用。其实,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体,企业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家利用市场的能力。“对某种投入的生产要素而言,或因没有市场,或因市场交易难以调节而不能圆满地履行合同,致使价格体系不能高效率地发挥作用。而企业家的作用,就是要弥补这种不完善的市场结构机能,去充分调动尚未市场化的生产(22)

上,与会的厂长、经理和学者们围绕“企业家与改革”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现将其中的几个观点综述如下:

一、怎样认识中国目前的厂长、经理?

厂长、经理究竟是一种职业还是官?长期以来,厂长、经理由行政机构按行政官员的标准进行选拔,按行政官员的办法进行任命,并按行政官员的方式进行调动,把厂长、经理看作是一种官职。实际上,在商品经济中,厂长、经理是一种职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展,厂长、经理作为职业的特征就越明显,其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行为。合格的成功的厂长、经理就是经营专家,是一种软专家,把厂长、经理按部长级、地师级、县团级、科级等来划分等级是不妥的。

厂长、经理究竟是在企业经营实践中产生还是人为地去任命?如果承认厂长、经理是一种职业,这就只能在企业经营实践中诞生,在经营实践中成长为企业家。那种行政任命厂长、经理的结果是,哪一级任命的厂长、经理实际上就对哪一级负责,他的眼睛就紧紧盯住任命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而不是盯紧市场。

要想从目前的厂长、经理中涌现出大批企业家,就必须淡化当官心理,实行厂长、经理职业化。从我国情况来看,实行厂长、经理职业化可能

(25)

历史反思

五十年代的道路 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人,无一不回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平静而美好的时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报纸上愈是起劲地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时,人们愈是觉得十七年所取得的种种成果的宝贵。事实上,在十七年中,除台湾等地区外,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然而,当“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在研究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以任何形式重演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既有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又有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因素,“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做法,也许同毛泽东和其他个别人物的性格、品质、心理、爱好有关,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文化大革命”前,人们认为,社会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实行了

(29)

“公差”,而不是看成可以自由选择的社会职业;更多的是热心“官阶”的升降,而较少地重视市场竞争和产品创新。因此,当今中国是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的。那末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厂长、经理呢?这些同志认为,这是因为有一批厂长、经理具有潜在的企业家素质,改革给他们释放经营能量提供了较合适的环境。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机制并未完善,他们的能量释放还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他们有时“碰壁”,有时遇“暗算”的原因。

三、如何形成造就中国企业家的客观环境?

不少人认为,产品经济造就行政长官,商品经济才能造就企业家。中国要产生一大批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创造出合适的土壤和温度。土壤就是市场,只有完善市场机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有合法的活动舞台;温度则是所有制,只有改革现行的所有制关系,让企业真正有经营权,企业领导人才能将自身的荣辱富穷与企业财产的增殖与否联系起来。有了这样的“土壤”和“温度”,既能独立自主决策,又能完全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出现,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产生的唯一的前提条件。与会同志还指出,创造出这样的“土壤”和“温度”,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对于推进改革,具有极大的意义。

(王资礼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文汇报》)

(27)

我国理论界关于“文革”起因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为什么能够发生这一悲剧?怎样才能防止这类悲剧重演?我国理论界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文革”起因进行了探讨:

一、“文革”发生的总根源。“文革”的发生固然与毛泽东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关,但是,并不是他一个人就能把“文革”发动起来。“文革”最根本的起因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才最终酿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动乱。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将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此后又陆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口号。1965年又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内容大体具备了。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为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气候,从而导致了这场全国性的灾难。

二、“文革”发生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

(31)

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地位

企业家作为组成我国社会的一个阶层，有其阶层利益。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企业家阶层的利益同整个国家利益和企业职工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企业家的利益同职工的利益密切相关，同国家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是，企业家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企业搞好了，企业家的贡献最大。相反，企业没搞好，企业家的责任也应该最大。因此，企业家的劳动报酬同企业实现的利润挂钩是合理的。只有充分重视企业家的特殊利益，才能极大地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作为一个阶层，企业家必然会组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企业家集团以维护其在社会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我国企业家还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发展各种企业家集团就更有必要。不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我国的经济就要受阻。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首先就要提高企业家在企业和社会上的地位。因此，企业家集团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的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取得较高地位的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赵明华摘自《世界经济导报》)

(28)

历史反思

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本来应能有效地阻止“文革”的发生。但在当时，党内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国家权力机关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障，缺少对公民权利的严格规定；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没有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如此这般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革”的发生，反而成了“文革”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

三、“文革”发生的经济根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解放初期全国的城乡经济有了迅速的恢复和高度发展。但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文革”发动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交叉路口上。一些国家领导人和经济理论家主张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提出了包括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在内的具体设施。应当说毛泽东是首先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弊端的；但是真正到了要进行经济改革的紧要关头，他却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采用更灵活的经济组织形式等一系列经济

(32)

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只要体制改革进展越顺利，职业化的过程就可能缩短。厂长、经理也只有走向职业化，才有可能真正造就中国企业家。

二、当今中国有没有真正的企业家？

一种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产生了一批企业家，他们善于经营，富有开拓精神，在初步形成的市场竞争中能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企业家，而要从中国目前情况出发，如果说中国至今还没有企业家，一大批企业为何在经营中取得成功？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至今没有严格意义的企业家，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具备产生企业家的环境和条件。这些同志认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并承担风险的人，不是由政府官员任命，而是在市场竞争的洪流中摔打出来的人。因此，产生企业家的客观环境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一是没有产生企业家的商品经济客观环境；二是没有从市场竞争中显露头角，自发地成长起来的独立的经营者；三是没有能够独立作出决策并实实在在由个人承担风险的厂长、经理。现在的企业领导人（包括国营和集体）基本上把领导企业的工作当成一种

(26)

按劳分配。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在经济上，计划和行政手段是“分配经济资源”的基本手段，“市场”在“分配经济资源”中没有多大作用；

二、在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

三、在思想文化上，个人崇拜逐渐滋生，“双百方针”被束之高阁，对外来文化采取简单否定和排斥态度。

为了巩固这样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是两家”等理论，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解放后又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逐渐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现象愈益严重，加之其他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当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现象，并考察“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时，可以说，五十年代的道路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道路，也是一条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太原王祥科摘自《法制文摘》严家其、高阜文)

(30)

改革的要求，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错误地采取了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

四、“文革”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封建社会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封建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表现为社会关系上的非民主化；经济关系上强调集权；政治关系上的皇权思想。唯上是从；文化关系上推行“愚忠”、“愚红”。这种社会历史状况解放后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根治，因而很容易产生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平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小农经济混作社会主义模式，并且采用“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方式，试图实现这种模式，加之其他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五、“文革”发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文革”这场民族性灾难的发生，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封建社会在我国早已成为历史，但维护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却仍然积淀在现代人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情感趣向等意识和无意识底层，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人们常常将自身外化出的专制与服从关系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封闭的社会体制下，家族的意识的扩大只能是从绝对服从家长、族长，转为服从社会，并把服从社会等同于服从领袖个人，因而有运动必然会有一呼而起。

(李石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工人日报》)

(33)

到挽救，即使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也总有错误，被“整”得痛一点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比群众更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才活得下去，否则“牛棚”里就不可一日居了。如果没有这一切，如果一边只是一群“打、砸、抢”的暴徒，一边都是清醒的自知无辜无辜而遭冤受屈之士，“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搞起来的。我读过的写“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没有一部写到那种整人者与被整者共同一致的虔诚，我觉得隔了一层的就是这里。

我常设想，如果我是后代人，或是外国人，读了这些作品，会发生一系列的怀疑：怎么一夜之间，全国那么多人都上了真正只是一小撮的反革命阴谋家的当，都跟在少数“打、砸、抢”的暴徒后面去整好人呢？被整的那么多人，为什么都那么俯首贴耳，任人鱼肉，不见一个挺身而出，辩明自己的清白，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其实也无须做什么设想，我的小外孙就曾问过我：“解放军是不是都归江青指挥？”我说从来不是，他瞪圆了小眼睛，问得我无词以对。“那江青这些坏蛋，解放军为什么早不把他们抓起来呢？”

巴金同志倡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我举双手赞成。我认为这是千秋大业，意义不下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但是“文革纪念馆”里，不能同那两个纪念馆完全一样，不能只陈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革

(35)

对于“文革”，我们有何责任

我不能接受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政治上被‘抱大’的一代”这一观点，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

一九四九年，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那时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具有新兴的向上的浩然正气。在这种环境中造就出来的一代青年，政治上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学习，我和我的同志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那时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和艰苦奋斗精神，可以在今天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成效。试看今日之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一切领域，这一代人正在挑起大梁，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如果不是他们的艰苦奋斗，今天各类学校的合格教师从何而来？科技成果又从何而来？

其次，说“对于党犯的错误，‘文革’的灾难。我们这一代是有责任的”，更是奇谈怪论。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培养的人，在“文革”开始时，只不过才二三十岁，且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地师级干部极少，省军级干部可能没有，中央委员连一个也没有，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中央的方针政策出了问题，我党几百位中央委员，数万、数十万高级干部尚不可逆转，把责任加在五、六十年代培养的一代人身上，是不公允的，也是荒唐的。

(山西王琪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中国青年报》作者吕吉美)

(37)

充分肯定“文革”中自杀者的历史功绩

《文艺报》一九九零年九月六日发表舒乙的文章说，过去有一种清规戒律，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如果自杀，就等于背叛。其实自杀者有懦夫，也有伟大的勇敢者，这要作具体分析。

文章说，最值得认真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的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纪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再做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陶铸、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

我想，有朝一日，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里将可能出现一个分馆，这个分馆的名字，直截了当，就是“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为的是专门纪念他们和表彰他们！

“文革”中的自杀者的勇气，首先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全然不顾世俗的清规戒律，成为一批倔强的叛逆者、抗议者。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会越来越珍惜这些伟大的勇敢者用自己的生命向世间敲响的声声警钟！

(刘清摘自《文艺报》)

旧事重提，需要认真反思

回忆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确是“很听党的

(39)

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罪证，还得展现出当时那种整人者和被整者共同一致的虔诚来，这才合乎真实，合乎科学，合乎历史，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这做起来不易，合适的展品恐怕很难搜集。譬如当时“牛鬼蛇神”们都写过一次又一次的交待和检讨，其中不乏虔诚之作，现在大概很难找到了。又如当时的“革命小将”们写过不少日记、信札、决心书，其中更多虔诚之作，现在大概更难找到了。我希望认真努力去找，也许还有奇迹似的例外残存，找到多少是多少。退而求其次，不是当时的史料，而是后来诚恳的回忆，例如巴金同志自己的几本《随想录》（如《探索集》中《说真话》、《再论说真话》等篇），也是很有价值的。可惜的是这样的材料也不多。再退而求其次，我们鉴别展品时，可以运用一个否定的标准：凡是有意无意否认自己或别人当时的虔诚，渲染自己或别人当时如何清醒，如何洞察阴谋家的诡计，这类的材料，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再退而求其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希望文艺家更真实地再现“文革”的历史，再现出那个大邪恶附大虔诚以行的时代来，不过这当然不能充作展品了。

（黄丽萍稿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官冰之）

(36)

虔诚的整人和挨整

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据说已经太多了，再多就看不利于“向前看”了。我不敢说已经看尽一切这种题材的作品，多不多我都没有根据来判断；但是，只就我所看过的来说，总有一种“隔了一层”之感。这就是我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参加过的那个“文化大革命”么？似乎是，又似乎不是，说不清楚究竟隔在哪一层。

某日，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来谈，他说：“将来的人，从现在的文艺作品中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坏人整好人’而已。其实，哪里是这么简单呢？我们当‘牛鬼蛇神’的，当时往往比革命群众更虔诚些。”

我不禁拍案叫绝，着！我苦思已久的隔阂正在这里，被他几句话就点透了。

真的，“坏人整好人”只是后来高度简化出来的公式罢了。而当时，至少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绝大多数人无不相信是“好人整坏人”，是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整“一小撮”。可怕的是这个绝大多数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正是在号召之下，凭着这个信心，理直气壮地去“整”那“一小撮”，或者赞同别人去“整”，或者不反对别人去“整”，更加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面，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的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

(34)

活”，的确是“积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为争取入团入党而绞得彻夜难眠；但现在回想起来，热情自然可喜，也的确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但思维方式却很不对头，根本未考虑“人的价值”，而是服服贴贴做“党的驯服工具”，“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时候的脑袋，根本不长在自己脖子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竟变成任人摆弄的工具和零件！记得一九六五年，党叫我们大学生去搞“四清”，为了对“走资派”，“四不清干部”不“心慈手软”，就先得“清”我们自己。那时，谁不把自己“清”成“修正主义苗子”？谁不把自己说成“挖社会主义墙角”？等到我们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之后，又恶狠狠地“清”广大农村干部，也搞得他们面目全非，满身污垢！那时候，我们根本无“人的价值”的概念，我们中的哪位敢思考党的决策是否有偏差？到了“文革”期间，我们中的哪位敢去思考“无产阶级司令部”有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岂不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听党的话”中做出许多蠢事来？客观地分析，几千年来源远流长，流毒甚广的封建“愚忠”，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一代人，让我们热血沸腾地做出许多蠢事来！清楚“左”的流毒已是“八年抗战”了，但在上一代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掌握了权的上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左公”仍阴魂不散。在当今两代知识分子对话时，中年人的确要清一清流毒，清一清自己过去在“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时做的傻事。

（河北冯舒文稿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中国青年报》作者张长兴）

(40)

要重视对“文革”历史的研究

在前不久，团中央召开的精神文明研讨会上，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王治光等青年理论工作者呼吁：要重视对“文革”历史的研究。

他们说，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改革，除了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东方社会主义改革两大背景外，一个直接历史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们对“文革”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的反思。今天的改革，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站在现代化的高度，对我们民族自身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而“文革”是关键性的一页。研究“文革”历史对于了解我们民族文化深层的思维方式、心理习俗，从而作为今天改革的“参照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单有“决议”还是很不够的。

但目前，我们却视“文革”研究为禁区。很多宝贵的“文革”资料正在丧失，相反，国外搞“文革”研究的专家、学者却有三、四百人，他们把“文革”视为法国大革命一类的历史。如果不注意此问题，将来的“文革”研究可能形同敦煌研究，遗址在国内，敦煌学却在海外。

（陈志新摘自《理论信息报》）

(38)

一年来所有制问题讨论综述

一、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

1、两权为什么要分离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由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联合劳动发展的不成熟性。第二种意见认为是由于全民所有制中存在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种不同主体,存在各自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由于企业相对独立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有的同志认为两权不能分离,而是所有权转让。

2、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通过国家所有关系来体现。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国家的最终所有权与企业的相对所有权。第三种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部分所有权(企业留成)。

3、关于两权分离的模式 有的同志将两权分离模式概括为:完全结合模式、部分分离模式、较高程度分离模式、基本分离模式和完全分离模式;而以基本分离模式比较理想。

有的同志认为在“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近中期模式、“企业所有、企业经营”的长期模式和“国家与企业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的过渡模式中,以长期模式为最佳。

二、我国现阶段所有制形式及其地位

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有的同志认为是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形式所有制结构,有的同志认为是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与带有私有制性质的所有制形式长期并存,有的同志概括为公有制占绝对优势下的

(41)

新型所有制形式初探

我们有必要实现对国营所有制在观念上的转变,只要能够更好地提高社会物质文化水平,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就不必拘泥于经典著作所描述的所有制结构。我们应该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各种经营方式彼此渗透相互补充的所有制结构。

具体措施为:1、迅速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然后,国家将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所有权移交给银行,由银行系统出面在各个企业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对银行负责,不参与企业的具体决策,但对企业领导人拥有任免权。董事会成员的收入与所有企业经营效果挂钩,对于长期亏损的企业,一律令其破产,并追究董事会成员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2、完善股票市场,将部分企业所有制形式改为股份制,分散所有权,主要用于两类企业。一类是经济效益较高的企业,其对社会投资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由股东代表组成董事会,负责制定经营方针和发展战略,任免企业领导人,董事会成员利益直接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联系,股东分红情况与经济效益相联系。另一类是经济效益平平的企业,国家可强制这部分企业从各种留利中提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同时鼓励并优待职工购买本企业股票,国家逐年缩小所占的股份。

(43)

取租赁、承包等方式。

第二种方案,是变全民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

这个方案的理论依据是,国家所有制是多年系预算软约束,从而使得企业生产者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低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的方向应是变全民所有制为企业所有制,真正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实行企业所有、企业经营、自负盈亏。国家的职能就是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使企业行为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三种方案,是推行全民所有制股份化,以股份所有制取代国家所有制。

股份经营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所要求的经济权力与经济利益相统一的经济关系。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部分资产应作价转让给企业,并吸收职工入股,国家成立控股公司,形成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合办企业的模式。

(上海李冬民摘自《采风报》)

全民所有制改革目标模式新

全民所有制的一种新的目标模式已经在孕育过程中,这种新的目标模式就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完善为全民系统所有制,即实现全民所有制关系主体的多元化、系统化,由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占有和协同支配其生产资料。

(45)

互开放、相互联系的内在层次。

(马立群摘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的二重化

目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所有权问题上,实际是二重化的。从单纯所有权上来说,归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所有,从经济所有权上来说,归企业劳动者集体所有。它们虽分属两个不同主体,但它们最终实现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

所有权的二重化,是由目前社会生产过程中联合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这就是全社会范围内联合劳动的存在和企业范围内联合劳动的存在。

确立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二重化的观点,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1、有利于揭示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商品关系的原因,只有承认企业具有经济所有权,企业间进行商品交换才能顺理成章;2、有利于合理规定国家和企业的经济职能及其权限,建立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3、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弥补“两权(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说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夏友梅摘自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理论信息报》)

(47)

3. 出租、承包部分小企业,可委托银行主持出租、承包事宜,调查承租、承包者的经济担保能力,实际经营能力,并对正出租、承包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一揽子追踪监督,建立相应的保险项目,以减少因承包者经营失败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健全有关法制。

4. 鼓励个体经营,鼓励外资独营、中外合资经营。

5. 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段钢摘自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海研讨会提出所有制改革的三种方案

最近,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社联等单位召开研讨会,讨论了我国当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问题。其中,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国家所有制的改革,围绕这个问题,与会者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完善国家所有制

改革的目标是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实现国家所有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同程度的分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如个别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直接经营;更多企业全民所有,企业自主经营;小型企业可采

(44)

八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营大企业兴办的集体、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联合经济、全民所有的集体或个体经营、个体经济。

2. 集体所有制经济地位及其“过渡趋势”有的同志认为集体所有制是灵活的公有形式,不存在向国家所有制过渡的必然性;有的同志认为两种公有制形式各有优势,应长期共存,走向结合;有的同志认为全民所有制仍为领导,集体所有制将来总会出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趋势。

3. 新合作经济的形式、地位及其与集体经济的关系 不同看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有可能成为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主体;新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独立的经济成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基本形式。共同看法:合作经济范围比集体经济广泛。

三、关于所有制关系的进一步改革

1. 股份制是不是所有制改革的方向 一种看法是全民企业不宜实行或不宜全面推行股份化,因为难以解决企业的短期行为,另一种看法是股份经济是所有制结构中的主要形式,是全民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2. 股份经济中谁占主体 有三种观点:以个人股份形式占主体,使全民所有制关系调整为非国家所有的股份形式;以企业股份形式为主体,把全民所有制关系调整为国家参与的民间股份形式;以国家股份为主体,国家掌握股票的大头,控制所有权,通过董事会中的代表,参与企业的主要决策,而不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

(李杰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工人日报》)

(42)

对所有制要有科学的理解

对所有制问题,我们要有科学的理解,不能简单地就把机械作价转让给职工就是改变了所有制。因为当代社会,所有权都不是完整的,让家庭承包土地,从法律上说还是集体的,实际上这个所有权已经交出去一部分了,不完全了。反过来,私人所有的资产也有公有成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所有。如果一个私人经营的东西,他收入的利润转成扩大再生产的资产,这个资产在运转,它就纳入了我们社会主义的范围。利润消费部分,是带个人性质的,如果消费部分我们用所得税加以限制,收回一些来,等于把他的部分剩余劳动收归社会所有。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制的界限不象切西瓜那样一下切得很干净。社会主义所有制,原来我们的观念,一种叫国营,一种叫集体,一种叫个体,其它就没有了。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别的所有制,比如说股份经济,公家可以用私人也可以用;各种所有制都可以横向联合;在个体基础上还可以实现某种联合。因此,过去形成的“三刀切”的观念,已经不能成立。三刀切,一层比一层高,国营是高级的,集体是中级的,个体是低级的。国营为什么就比集体高?如果论效益不一定就比集体高,贡献也不一定就比集体大。

(毕克摘自一九八六年九月《经济参考》)

(43)

从客观逻辑来说,所谓全民所有制,就是全体劳动者个体都具有平等主权的股份均等所有制。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个体是否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只是在于在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上,私有制只承认“一物一主”,而不承认“一物多主”;公有制则只承认“一物多主”,而不承认“一物一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否定和取消劳动者个体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只是把这种所有权直接融合在劳动者个体对其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使其经营权与所有权二者和谐统一。全民系统所有制的具体内容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关系主体是一个对象化了的系统整体,从而把原来由国家直接经营的所有大、中、小型企业,都由国家委托给该企业的全体职工自主经营。为此,企业就需要以独立财产主体的身分同国家发生财产关系,即通过平等契约的形式同国家共同占有和协同支配其生产资料,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原来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完善为具有三种权利主体(即国家、企业、职工)、三种权利客体(即国库、企业财产、职工劳动成果)和三种责任层次(即国家的宏观间接调控责任、企业的自主决策责任、职工的岗位责任)的全民系统所有制。其主体之间的系统层次,则由劳动者自主联合经营的相关程度所决定,在不同的“相关度”上,便形成劳动者个体岗位自主经营、企业自主经营、企业集团自主经营、企业托拉斯自主经营、企业托拉斯集团自主经营、全民经营这样一些彼此相

(46)

春节的古今

春节，这个古老而又富有魅力的传统佳节，伴随春天又如期而至。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这幅春联说的是，阴历年腊月三十夜晚，从零点起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人的年龄也增加了一岁。

阴历又叫旧历、农历、夏历。阴历是从夏代开始的，直到一九一二年，我国才采用国际通用的阳历，但还同时采用阴历。

春节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很多，经过长期演变，现在又有了新的内容。

例如春节前的大扫除，早在宋代就有这一习俗了。据记载：除夕前，“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这习俗流传到现在，就是春节前大搞环境卫生，防病保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放爆竹和贴春联，有声有色，增添了节日气氛。南北朝时，就有正月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燃放爆竹的风俗；宋代王安石写下“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名句；清代制造出了花炮，如今，放爆竹与燃放烟花，展示出团结欢乐的景象。至于春联，起源于在桃符板上写两个能驱鬼的神仙名字：“神荼”“郁垒”，首次见于记载的春联，是五代时孟昶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来，随着春联的普及，大红纸代替了桃符板，内容大多是反映

(49)

如果万一喝醉了酒怎么办？可将白菜心和萝卜切成细丝，加上醋、糖凉拌食用。也可将大白菜帮加醋腌渍十五分钟后取出，再倒入醋、糖炒成菜，热吃或凉吃。另外，喝浓茶、吃水果，喝味道清淡的菜汤，也可解酒。还有的人用萝卜菜煎汁，用研砂二钱研成细末，冷开水调服；用酸枣和葛花、葛根各十至十五克同煎饮服，也是行之有效的解酒办法。如酒醉程度严重者，应送医院诊治。

请君适度饮酒，欢度佳节！

(江西彭以防摘自《山西青年》)

节前“扫尘”八法

按我国传统的卫生习惯，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搞一次大扫除。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些扫尘的方法。

一、厨房里被灰尘和油腻沾污的纱窗，可先将帚子扫除表面的灰尘，再用十五克洗洁精加清水五百克，搅匀后以旧牙刷蘸着，在纱窗上面刷一遍，再以抹布在正反面都揩一遍，尘垢即可清除。

二、竹藤器的积垢，可用盐水擦拭。既可去污又能使竹藤柔软而有韧性。

三、对有怪味的饭菜橱或电冰箱，可用小盘子盛些木炭放在里面，因木炭有很强的吸附气味的能力，怪味可以被吸收掉。

(53)

糊，灯笼的表面，常绘以山水、花鸟或人物、历史、神话故事等，还有更甚者，在上面写上谜语，开展猜谜语灯谜晚会。

(江西彭以防摘自《江西日报》)

年画琐谈

年画，是我国民间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历史悠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年画起源于汉代，最初的形式是门神，画的是神话人物神荼郁垒。也有“画虎于门”“画鸢于户上”的，用意是清灾纳福。隋唐以前，年画都是直接绘在桃木板或纸上。宋代始出现木版着色和套色年画，现存最古的一幅木刻年画是宋刻《四美图》，画着古代四位美女。明末清初的“三大民间木刻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县年画）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年画渐趋全盛，驰名国内外。

我国传统的年画形式多样，内容极为丰富。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明朗，色彩鲜艳，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且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是我国绘画艺术的一块瑰宝。

(江西彭以防摘自《江西日报》)

(51)

际，亲朋好友总要互寄“贺年片”，向对方表示祝愿。

其实，贺年片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它起源于我国汉朝，当时称为“名谒”或“名刺”，到了唐宋时称为“门状”，明清时又称为“红单”。

最早的贺年片不是用纸制作，而是用木、竹片削成的，因此叫做名刺。这种名刺同如今的“名片”有相似的性质。据赵翼《陔余丛考》载：“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初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旧制。”《事物纪原》也说：“汉初未有纸，书名于刺，削木竹为之。”

不过，古代的“贺年片”，并不是一般人都爱用的，主要是一些高官、显贵、士大夫们采用，他们自诩清高，每逢新年来临，不肯自己出门拜年，便派人送“贺年片”，正因为这样，当时谁要是送“贺年片”，往往要受到别人的讥讽。明朝的文征明曾在他写的一首《拜年诗》中揭露过高官显贵们的这类虚伪客套。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由此看来，古代的贺年片与现代的贺年片是有区别的。

(卢荣摘自《解放军报》)

(55)

春节话酒

酒是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饮料，它以芳香、浓厚、强烈、轻爽而高爽，博得很多人的喜爱和嗜好。新春佳节，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人们都喜欢传杯换盏，沽酒相叙。遇到喜庆临门，宾客入席，更免不了举杯庆祝，开怀畅饮。人们用辛勤劳动酿造的琼浆美酒，逢年过节都要让它溢彩飘香，为我们增添热烈的气氛。

我国已有四千多年的酿酒悠久历史，目前全国拥有数以百计的各类酒的品种，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绍兴黄酒、青岛啤酒、金奖白兰地、杏花村竹叶青、北京中国红葡萄酒等驰名中外，誉满全球。

饮酒适度可以起到活血通络、暖身御寒的作用。某些中药常以酒作引药，通过饮用药酒对治疗一些疾病，能收奇效。少量饮酒可起到提神助兴作用，但要适量。饮酒还要因人而异，体质差或有心、肺、肝、肾疾病的人不宜饮酒；女同志不宜饮烈性白酒；少年儿童更不应让他们喝酒。有酒量的人也应“四忌”：一忌过猛，二忌过量，三忌空腹饮酒，四忌借酒浇愁。如果没有节制，喝得酩酊大醉，极易造成酒精中毒或肝硬化，伤神害体。

(52)

贺年片的来历

若问贺年片的来历，也许有人会以为那是从外国传来的，其实不是。据说早在明朝天顺年间，我国就有了贺年片。那是把一种印有梅花图样的笺纸裁成约二寸宽、三寸长的大小，上面写着姓名和地址。到了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在朋友之间相互赠送，甚至连不大熟悉的人也送上一张，使交游的面更为广泛一些。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就改用红色的硬纸片来制作了，还把贺年片装在当时很盛行的一种锦盒里送给对方，表示郑重。到了民国初期，由于受到外来影响，不仅是旧历新年（春节），就是在公历新年，也有送贺年片的，而且花样多了起来。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使贺年片的种类大大增多了。新春之际，向亲朋好友送一张贺年片表示祝福，是祝贺节日的好办法。

(沈阳马永贞编写)

(56)

人民心愿

在民间，春节还有“除夕守岁”的习俗，“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围炉团坐，达旦不寐。”守岁一般是在吃过年饭后，我们今天过除夕，虽不再“达旦不寐”，但人们仍然习惯放爆竹。爆竹之声，此起彼伏，长夜不断。一家人聚集一堂，坐在电视机旁，伴随着欢声笑语，在赞颂党的强国富民政策，赞美四化建设的歌声，憧憬着祖国美好未来的思绪中，除旧迎新，开始新的战斗！

(江西彭乡摘自《前方报》)

新年絮话灯笼

大凡逢年过节，吉祥喜庆之日，人们总喜欢张灯结彩，以示庆祝。“正月十五闹花灯”，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元宵佳节。

灯，古时又称“镫”，一般燃点于屋内，倘若用于室外，就配制防风设备，加上竹骨纱罩做灯笼，因此，人们就把它称为“灯笼”。用不同的制灯工艺，综合绘画、剪纸、扎纸、编织、刺绣等制成的灯笼称为彩灯，在古代最为著称的要数宫灯和纱灯。通常所见的盘折形、斗形、心形、钟形、葫芦形的彩灯是由宫灯演变而来的，而花瓣形、方形、伞形、亭形的彩灯，则是由纱灯演变而来的。我国的灯笼，大都用绢、绸、纱、纸等进行裱

(50)

四、茶具上积聚的褐色茶垢，用水很难洗净。只要在布上蘸少许牙膏擦洗，便可除去。

五、当厨房里出现异味时，可在锅里放少量食醋，加煮后，随着食醋的蒸发，异味便可消失。

六、污损了的皮革制品，可用一块干净的绒布蘸些蛋白液擦拭，既可去污又能使皮面发亮。

七、家庭摆设的石膏装饰品上的灰尘，可先用毛刷掸去浮尘，然后用面粉加少许清水，调成糊状，以毛刷涂抹，干后再用干净的刷子刷掉，积尘也就随着面粉脱落。

八、油瓶里若积聚着油垢，可先往瓶里放些熟石灰和砂粒，再冲进半瓶热水，将瓶塞塞紧，然后反复摇动油瓶，因砂粒的冲击磨擦和熟石灰水的作用，油垢便可清除。

(南昌武立军摘自《江西日报》)

古代的“贺年片”

贺年片在现代已经比较流行，每当新年来临之际

(54)

编辑 资料卡片编辑部
出版发行 资料卡片杂志社

(地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夫路)

印刷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 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内蒙古期刊登记证第0131号

定价 0.17元